

謝雪漁漢文小說中的 文化演繹與身分編寫： 以〈三世英雄傳〉、〈櫻花夢〉、 〈日華英雌傳〉為中心的討論

王韶君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中文摘要

現有研究關於謝雪漁（1871-1953）的研究，主要從漢學、通俗文藝、同文政策、東亞論述等議題，用以討論日治時期謝雪漁的漢文、漢學書寫與政治理念。承繼先行研究的啟發，筆者則是想進一步探究，謝雪漁處在帝國殖民的時空氛圍下，如何透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結與書寫，表達出對中國與日本的觀看以及身分想像。筆者將以謝雪漁在日治時期所寫的三篇漢文小說：〈三世英雄傳〉（1912-1913）、〈櫻花夢〉（1934-1935）、〈日華英雌傳〉（1937-1938）為中心文本，作一歷時性的觀察。本論文的問題意識雖是以中國與日本的對話開啟討論，但更深層的目的卻是關於謝雪漁在不同時空情境下，對世界的想像、對中國的態度、對自我身分的思考，特別是作者為台灣提出什麼樣的詮釋。

關鍵詞：文化演繹、文化差序、身分編寫、落後的時間感、不在場的台灣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Edit
of Novel of Sinology by Sie Syue-yu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San Sh Ing Syong Jhuan”,
“Ing Hua Meng” and “R Hua
Ing Cih Jhuan” as the Central**

Wang, Shao-chun

Ph. D,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Sie Syue-yu's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backgrounds are mainly from issues of Sinology, popular culture-writing, the Same-Culture policy and the discussion in East Asia to discuss Sie's Sinology, Sinophone Writing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herited and inspired by prior studies, I would like to further explore how Sie Syue-yu view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which was broken by Imperialism when 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Taiwan” in Imperial colonized period. Therefore, my attempt is to discuss three

novels of Sinology by Sie Syue-yu: “San Sh Ing Syong Jhuan” (1912-1913), “Ing Hua Meng” (1934-1935) and “R Hua Ing Cih Jhuan” (1937-1938) as the main text to discuss how he used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to translate and edit the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selfness”, and how he interpreted “Taiwan”.

Key words: culture transl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dentity edit, lagging time, alibi of taiwan

謝雪漁漢文小說中的 文化演繹與身分編寫： 以〈三世英雄傳〉、〈櫻花夢〉、 〈日華英雌傳〉為中心的討論*

一、前言

謝雪漁（1871-1953），本名汝銓，字雪漁，號奎府樓主、奎府樓老人。具有傳統文人的身分與學養，日治時期擔任《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記者。在書寫創作方面，除傳統詩文，亦進行通俗文學的創作。目前關於謝雪漁的研究主要是從漢學、通俗文藝、同文政策、東亞論述等觀點出發，討論日治時期謝雪漁的漢學主張、漢文書寫與政治理念。雖然相關的研究論著是以不同的視角探討謝雪漁在不同時期書寫的作品，但卻共同呈現出對謝雪漁的文化、身分認同等議題的關注。

在現有研究方面，蔡佩玲和吳毓琪以傳統詩社與漢文書寫的角度切入，蔡佩玲著重從「漢文到同文」的置換過程，討論謝雪漁在日治時期的漢文書寫歷程¹。吳毓琪則是以謝雪漁在面對來自詩社所保留的傳統／舊文化與殖民者引入

* 本論文初稿曾宣讀於「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主辦，2013年7月30-31日）。感謝會議評論人黃美娥教授與三位匿名審查人惠予寶貴建議，使本論文更臻完整，謹此致謝。

¹ 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

的新文化時，在新、舊文化交接之際的抉擇與自我認同²。林淑慧以通俗文學的角度，討論謝雪漁如何在〈日華英雄傳〉中以女性身體積極介入國家話語下的「國體」建構³。同樣的，在林以衡的論文中也用了「國體」的觀點，闡釋謝雪漁在〈新蕩寇志〉中借自中國章回小說的改寫目的，是為迎合昭和年間日本的軍國主義，而在書寫上將原小說對「中國帝王」的推崇轉換為對「日本神國」的政治認同⁴。事實上，謝雪漁以「元寇」作為處理或聯結中國和日本之間戰爭問題的書寫元素，在1912年發表的〈三世英雄傳〉中也曾出現過，然而，有趣的是，在研究者的論著中，對於運用元寇作為歷史書寫題材所牽引出的「政治認同」探討卻有不同的看法。

異於林以衡認為謝雪漁在認同上的主動轉換，薛建蓉以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東亞同文論述構架為謝雪漁的政治文化認同提出解釋，一方面為謝雪漁接受日本提倡東亞論的認同提出說明，另一方面認為「謝雪漁是站在漢民族為中國政權正統的立場，稱元為寇」，最後又提出謝雪漁「在尋找自我認同時，很容易不斷地被自我改寫，卻不自覺的改寫成為服膺統治者的政治工具」⁵。薛文是以二〇年代的東亞論為起始，進而討論統治者在三〇年代的東亞政策論述對謝雪漁的影響。這種「不自覺而服膺於統治者」的矛盾與困境，在柳書琴以傳統文人的文學場域《風月報》與「漢文同文主義」政策的討論中則更為明確，說明謝雪漁等傳統文人在殖民者的同文主義政治語境中，雖走出半自主的「自我同文主義」道路，最終卻不免落入殖民者的「興亞文學」政策之中⁶。異於上述圍繞在政治文化認同、是否趨近統治者東亞政策言論的研究論述，林芳玫則是以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² 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頁83-124。

³ 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雄傳〉〉，《中國文學研究》第24期（2007年6月），頁119-152。

⁴ 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9年9月），頁169-204。

⁵ 薛建蓉，〈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年4月），頁39-78。

⁶ 柳書琴，〈第三論 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Taiwan, 1937-1942）〉，收於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63-90。

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並加入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族寓言與性別的觀點，進一步為謝雪漁的作品以及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藝的解讀提供另一層可再深入思考的路徑⁷。

上述的研究成果呈現殖民統治下，環繞在謝雪漁及其作品所延伸出的多面向討論，承繼著既有的研究成果與啟發，筆者在閱讀謝雪漁小說的過程中也發現，其經常運用中國與日本在歷史、文化上的關係性（relational），開啟中國與日本的對話，我們可以看見他如何透過對中國的評述進行發言，也可以看見他如何與殖民者的政策進行呼應，但在許多隱而未顯的曖昧文句中，卻也透露出他對台灣的論述與書寫，這一點促使筆者想進一步以「文化演繹」和「身分編寫」這兩條路徑出發，來討論謝雪漁在日治時期所寫的三篇漢文小說：〈三世英雄傳〉、〈櫻花夢〉、〈日華英雌傳〉⁸。「文化演繹」是指謝雪漁運用中國、日本之間的歷史親近性，延展兩國在歷史、文化、文學甚至是飲食習慣等方面的關係性（relational），作為中、台、日三處的文化交涉之論說依據。另一方面是指在東亞與西洋之間，透過漢文、漢文化，對內用以連結東亞，對外則是可以橫跨在東亞與世界之間。而「身分編寫」則是指謝雪漁依「文化」預先設定的條件進行身分的編寫，編寫包含編輯（edit）與書寫兩項概念，而身分（identity）同時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指中、日兩國在歷史、文化、文字上具親近性的東亞身分，二是指台灣身分的出現與再現。

謝雪漁在日治時期發表的漢文小說數量頗豐，作品涉及的議題層面亦廣，筆者以此三篇發表於不同時期的小說作為討論文本，是因為有幾項共通的主

⁷ 林芳玫以詹明信的國族寓言作為研究方法，專注在漢文小說〈日華英雌傳〉的討論，提出「跨文化身分編輯」與國族寓言的概念，認為謝雪漁對於漢文的巧妙運用是「是面對多重殖民矛盾時的解決方式」，關注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這項研究觀點與筆者有相似之處，但不同的是，筆者則是在討論謝雪漁對於中國、日本的書寫之上，進一步觀察謝雪漁如何透過對中國的運用，去看見世界，進而發覺自我身分、書寫台灣的過程。詳請參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份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年12月），頁29-62。

⁸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1912]年8月24日，第4395號至大正2[1913]年1月10日，第4527號。雪，〈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9[1934]年11月7日，第12428號至昭和10[1935]年6月22日，第12653號。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12[1937]年7月20日，第45號至昭和13[1938]年12月1日，第76號。

軸：中國—台灣—日本在歷史上的親近性、同文同種與漢文論述、日支（華）⁹親善與東亞和平的倡導。文本中的空間經常跨越、穿梭於「台灣—中國—日本」三處地域，作者透過文本構築作品人物可以共時共處的空間，並藉由漢文化的淵源進行多層次意義的連結，並運用傳統資本（漢文／學）作為文化發言的策略，但傳統（漢文／學抑或國家）的樣貌卻因被變異地置入帝國日本的歷史脈絡中，而顯得模糊難辨，致使文本中的傳統只有過去而無現在。作者在文化的連結上，以自外於時間感的立場，進入文本時空企圖進行對話、發言，透過情節、人物、文化等條件的鋪陳，形成中、日之間的「文化差序」。在時間的安排面，作者不斷地以「落後的時間感」¹⁰，努力想銜接於帝國（日本）的過去與現在，並重新編寫自我（台灣所代表的重層主體）的身分（文化的身分與人物的身分）。同時，在身分議題上，則是以「台灣」作為觀看與發聲的位置，則被作者隱身在文本背後，作者既站在台灣訴說自我，卻也將自我與台灣隱藏於文本之後，造就本文中「不在場的台灣」¹¹。

此外，本論文所指的「傳統」是以謝雪漁歷經不同政權的生命經驗為中心，指向來自中國所象徵的一種既有的傳統價值中心，並包含漢文、漢學、漢文化。這些「傳統」是謝雪漁這類台灣文人所既有的文化資本，殖民者也運用這些文化資本發言場域的建構，然而，從謝雪漁的小說將會發現，台、日雙方在這個既定的發言場域中使用共同的媒介去書寫、想像中國，雙方所想像的中國看似

⁹ 日治時期台灣對中國以中國、支那、中華等名詞稱之。本論文在論述中，一律以「中國」行之，部分援引自舊籍、作品的段落，以及有時為配合行文語境時，會以「支那」稱之，特此說明。

¹⁰ 筆者提出「落後的時間感」一詞，是為用以表現謝雪漁在作品中不斷以「過往的」時間，回溯過去與連結現代，並有意無意地穿插作者個人身處的現實時空，形成文本中「落後的」敘事時序。另一方面，也受到邱貴芬在討論現代主義時期女性作家以「落後的時間」創作出的另類時間與空間，作為論述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的可能對策的觀點的啟發。請參閱邱貴芬，〈落後的時間與台灣歷史敘述：試探現代主義時期女性作家創作裡另類時間的救贖可能〉，《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83-110。

¹¹ 筆者從謝雪漁作品中發現「不在場的台灣」這條脈絡之後，受到李育霖研究的啟發，他提到《亞細亞的孤兒》主角胡大明不論在日本或中國，總是以隱喻式的、以另外的身分存在及發言，認為吳濁流「不斷表明作為『台灣人』身分出場的不可能性，主角必須不斷地假冒他人或使用另一個名字，另一種出身」，「此種宣告又隱藏身分的作為構成了他的『不在場』(alibi)，以及他的外來(alien)身分」。李育霖，〈附錄：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闖境：主題、倫理、美學》（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200。

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根源上，但在運用過程中卻已產生差異，特別是謝雪漁在書寫過程中所延伸出對世界知識的觀察以及台灣身分的書寫，便說明了傳統所帶出的他者效應。

以下，首先將觀察謝雪漁如何運用歷史連結中國、台灣與日本在文化上的親近性，書寫出什麼樣的文化差序。其次，討論謝雪漁在文本中對空間的界定，建構出什麼樣的世界空間與知識體系，在限定的空間下，如何站在台灣這個位置上觀看中國與日本。同時，隨著外在時空情境的變遷，又如何援引傳統對自我的文化與身分進行演繹與編寫，進而探究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為台灣提出了什麼樣的詮釋。

二、開啓文化的重層演繹

（一）落後的時間感：中國與日本的差序

謝雪漁在這三篇寫於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共同使用了中國的歷史與人物——徐福與鄭氏家族（鄭芝龍與鄭成功）作為開啟「中國—日本—台灣」在歷史上交疊的必然關係，以過往的中國與日本在血緣、歷史上的親近性，作為開啟多方主體連結的起始，以衰敗的中國樣貌突顯與日本的差異，呈現出「古老的中國」與「維新的日本」兩種對比形象，達到以日本歷史發展為中心的合理性。特別是，這項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歷史是以「落後的時間感」進入日本的空間，經過本質上的融合與轉變，變異為屬於日本的、文明的、進步的文化。

1912年發表的〈三世英雄傳〉首先開啟了援引中國歷史人物進行文化演繹的書寫。何謂「三世」？從文本來看，一世是徐福，二世是徐士奇，三世是徐一郎。分別代表了來自中國、從中國到日本（同樣來自中國或中日聯姻）、在日本出生的中國人、日本人這三個世代。

茲得諸傳聞。謂德川幕府末造。明治維新初年。有三世英雄。其人其事。為正史所未書。而言者鑿鑿。似非虛無縹渺。……話說德川幕府末造。有徐士奇者。號秦餘。世居徐福村。其先世謂是秦始皇時遺徐福入

海。求神仙不死藥。福携五百童男女去。浮槎至日本。見山水明媚。卜居海濱。將童男女配偶。生聚日繁。時童男女既不自知譜系。又以從徐福去故冒姓徐。士奇一家。亦是五百童男女中之所傳。其號秦餘者。示不忘祖也。¹²

文本中的日本是處在維新之際，時值「改元明治。將軍歸政。幕府已倒。庶政維新。採用西法。豫備立憲。付人民以參政權。是為日本帝國氣運。合應中興。故有此聖明文武之天皇。」¹³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是發生在 1860 至 1880 年之間，日本歷史上的「改元明治」是 1868 年，但謝雪漁設定文本中的徐一郎時年十八歲，因此，回溯文本開始的時間應是 1850 年左右，亦即謝提早了「改元明治」的時間點。接著，文本又繼續進行到 1877 年日本發生的西南戰爭，此時徐一郎等人即將由德國學校畢業，遇家鄉有戰爭，急想返家，但中國留學生鄭繩祖卻說：「貴國兵亂之時少。故一聞兵亂。便如此之憂愁不已。如敝國則疆土廣漠。人心易搖。亂時多治時少。人視兵亂為尋常事。若欲引以為憂。則畢生都在憂患之中矣。」¹⁴由中國留學生說出這一席話，對比了中、日兩國留學生對國家內亂的態度，呈現出（日本）安定與（中國）戰亂的對照。如同在〈櫻花夢〉中，當中國人謝山輝等人在台灣從報紙上得知泉漳變亂而憂慮時，由日籍台北廳長對山輝等人說：「中國鼎革後。干戈擾攘。司空見慣。星星之火。未必燎原。」¹⁵再一次呈現中國在人們心中不時戰亂的國家形象，也更加突顯中國社會長期處於戰亂的危機。尤其，相較於同時期的中國局勢，謝雪漁以徐一郎在迷途中巧遇狐妖，不畏迷信而殺之，提出當時中國仍處迷信、封建，對中國戰爭能力的質疑，而日本國內雖有戰亂，但在被謝雪漁延後的時序之下，卻仍呈現有秩序、已經進入維新狀態的形象。

「如當時義和團之變。謂有術能避刀劍其他軍器。及至各聯軍至。大小彈子。紛落如雨。其術不靈。狼狽四竄。累得清西后與光緒帝。蒙塵西安。」¹⁶在

¹²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8 月 24 日，第 4395 號，第 6 版。

¹³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9 月 21 日，第 4422 號，第 6 版。

¹⁴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12 月 12 日，第 4500 號，第 6 版。

¹⁵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5 月 1 日，第 12601 號，第 8 版。

¹⁶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9 月 30 日，第 4430 號，第 4 版。

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關於歷史時間的問題，日本在 1868 年改為明治元年、1877 年發生西南戰爭（即文本中，徐一郎等人即將由德返日之際），同時，謝雪漁將中國在 1900 年前後發生的「義和團之變」加入討論，前面與日本有關的兩個時間點並無法與後者的中國時間順接，何以如此呢？在徐一郎殺狐、破迷信之後，謝雪漁有了這麼一段描寫：「作者寫此一段。在閱者諸君不幾疑為如聊齋之妄言妄聽。」¹⁷作者企圖發言，並接著提出義和團之變作為比喻，將中國當代的戰爭觀念與過往的日本相置比較，呈現了中國更為落後的形象。尤其，不同於日本學生渡洋留學是為振興國力，「清國青年」是為「覆滅滿清宗社者」，呈現中國人不認同中國的混亂情況。

鉅鹿細語一郎曰。李奇昔常於醉後語我。謂彼等之出洋留學。別有用心。蓋將以之覆滅滿清宗社者。……。長雄曰。現時清室之氣運未終。老臣宿將俱在。彼等權不在握。力何能為。只自革其命耳。鉅鹿曰。清國青年既抱有此思想。是為清國之大隱憂。然苟能探究其所以激成青年發此思想之理由。而籌補救之方策。則其為禍也或不烈。¹⁸

不同於〈三世英雄傳〉以中國秦代作為開啟中日歷史連結的途徑，到了〈櫻花夢〉集中在以鄭芝龍父子為中心的發展，以清法戰爭開啟「中國—台灣—日本」之間的關係¹⁹。〈櫻花夢〉自 1934 年 11 月起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小說一開始也是以中國處於清國時期的形象出現，作品人物的身分、服飾提示了時間感：莊慕周由參加鄉會試到留學日本陸軍大學、謝山輝是「穿馬褂長袍的前清清鄉總辦」，後與慕周合作組編軍隊、日人鄭太平赴美留學，後再赴中國留學。一直到作品中段的部分，由謝山輝曰：「梁任公前年亦曾渡台。有遊台詩卷。語多悽惋。」²⁰由此可得知文本中的時序是 1913 年，當時「民國」已經成立，謝雪漁在〈櫻花夢〉中將前清（攝政王）與民國（總統）兩種政治秩序並存，

¹⁷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9 月 30 日，第 4430 號，第 4 版。

¹⁸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11 月 30 日，第 4488 號，第 6 版。

¹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1 月 9 日，第 12490 號，第 12 版。同前文，昭和 10[1935]年 3 月 31 日，第 12571 號，第 12 版。

²⁰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5 月 3 日，第 12603 號，第 8 版。

引領出中國紛亂的社會局勢：殘兵、流匪、兵匪、「權臣當國。朝政紊亂。」「忽報革命軍起。全國紛亂如麻。」²¹用以對比出日本的安定與秩序，特別是透過支那的匪亂，強調台灣的民安。

而當謝山輝等人決定「遊歷扶桑」後，謝雪漁便切斷了跟中國時局有關的敘事，中國仍停留在前清、民國、兵匪、革命軍、國民黨等多重混亂的局勢，然而，當這些「支那人」由日人鄭太平帶領進入台灣之後，開始由「落後的支那」進入「現代的（日本）台灣」。特別是，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歸國後，任職於中國外交部的中國人鄭忠漢以「考察日本治台灣政務藉資參考」²²的方式進入台灣，這項安排一方面呈現藉由觀看台灣的同時也觀看中國，另一方面則是說明中國與台灣的分離關係，也開始了雙方以台灣為中介，「實行國民外交。以造親善基礎。」²³的用意。

謝雪漁以處在殖民地下的台灣具備完整的殖產專賣制度、教育制度、警察機關等體制，對比於中國經濟制度（禁阿片）、社會局勢（兵匪軍閥）的混亂。另一方面，渡台旅券制度也呈現了台灣與中國是不同國家的現實，鄭太平告訴謝山輝等人，外國人欲遊覽台灣需領旅券：

凡欲渡台北。除台灣籍民原領有旅券者外。不論身分如何。若無特別交涉。領有領事證明者。概要對華民會館。納一定之規費。領得勞働著路照。經水上警察查問。乃得許可上陸。²⁴

由日本人鄭太平向具「前清」身分的謝山輝等人說明渡台規定，更加突顯台灣與中國已分離的差異。

異於〈三世英雄傳〉和〈櫻花夢〉中，以「中國人成為日本人」的歷史作為連結，1937年7月起連載於《風月報》的〈日華英雄傳〉中則是直接以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對話作為起始。小說以日本女性前川壽子作為代表，壽子生於東

²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9[1934]年12月4日，第12455號，第8版。同前文，昭和9[1934]年12月9日，第12460號，第8版。

²²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0[1935]年2月15日，第12527號，第12版。

²³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0[1935]年3月19日，第12559號，第8版。

²⁴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0[1935]年3月22日，第12562號，第8版。

京，壽子的父親伊藤實平曾駐英帝國大使館書記，曾隨父赴倫敦，後亦隨父親赴任三井家在中國漢口的支店長。因此，在這篇小說中，塑造了懂漢文、識支那時勢、食慣支那料理、在支那生下女兒晴姑，並能鼓勵其夫婿前川剛轉任上海領事的親善支那的日本女子：「蓋壽子素喜研究支那學術。知非由其語言文入手。終是得其粗不得其精。」同時，其夫婿前川亦深思熟慮：

素知東亞安定。世界和平。非日華提携。兩國親善。絕對不可能。而乃支那朝野。大多數之人。口談親善。心存猜疑。非使之徹底了悟。兩國之間。禍根滋長。不知何時。將發出大不祥事。破壞東亞大局。爰欲渡支經驗。未雨綢繆。踴躍赴任。²⁵

謝雪漁預設了這位懂得東亞局勢的日本女性壽子作為開展東亞的解說，透過「解說」的行動，對比出漢文／化進入日本空間後的質變。漢文的進展與變化，無法脫離外在環境與文化政策的影響。台灣在 1937 年 4 月廢止漢文欄，同年 7 月爆發中日事變（盧溝橋事變），隨著戰事的擴大，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進入戰爭狀態，漢文雜誌《風月報》的續存與攏絡漢文階層和戰爭動員宣傳的需求有關²⁶，〈日華英雌傳〉便是出現在此時代背景下的作品。蔡佩玲也以同文政策說明「這種以『漢字』為基礎所形成殖民地『同文』的關係，會使漢文與同文產生轉換的可能性，並配合時局持續重述，而日台雙方由此展開跨界交流、各取所需、反覆辨駁的狀態。」²⁷林芳玫更進一步以 Szeman 針對詹明信國族寓言所提出對同一與非同一的身分思考，對漢文的功能提出了論證：

漢文因而是面對多重殖民矛盾時的解決方式：既可以保存自身固有文化，又可以吸收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在此過程中，漢文從儒學式的自我文化認同轉變為文化資本，用以協商傳統文人在變動場域中的地位。²⁸

²⁵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2[1937]年 11 月 15 日），第 52 號，頁 7。

²⁶ 同註 6，頁 74。

²⁷ 同註 1，頁 157-158。

²⁸ 同註 7，頁 53。

當謝雪漁在對比出中日之間的差序之同時，也呈現了源自中國的歷史進入日本空間之後卻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在許多段落裡都可以感受到作者企圖強調這種「變化」，比如來自中日之間在政治社會局勢、料理方式、服裝風俗等方面的不同。這樣的質變除了是「為彼此氣候之不同然者」²⁹，亦可見謝雪漁受到統治者所提出的「日華（支）親善」政策的影響，而在文本中愈加明顯的描寫必須親善的原因、理由與作法。

我們可以先回到〈櫻花夢〉來看，謝雪漁透過日人留支學生鄭太平之口，道出以漢學作為「與中華人士交游」、「實行東亞清理工作」的功能性意義：「今奉父命。為留學生渡華。將專攻漢學。研究中國事情。以聯絡日華感情。維持東亞局面。擁護世界平和。恢復祖宗馨譽。」³⁰而當謝山輝（支那）與鄭太平（日支混血）談到漢文與日文之間的相通性，太平說：

學文易於學語。日本文字優劣。在用漢學之多寡。與用漢字之當否。惟文意之反正。在假名字。故雖不曾學日本文。翻閱和文著書。亦可通其半。語則不然。不學則一語亦不能道也。³¹

這段話雖然呈現中日兩國有共通的漢學作為連結，卻也更加突顯兩者之間存有差異。從突顯差異到相互尊重，或許與外在時局日益傾向中日親善的政策有關。不過，筆者好奇的是，這樣的論述是為了強化日本的獨特性，或是為維護中國與日本的差異呢？謝山輝等人與日人代議士對奕時的對話來觀察，山輝說：「日本人之研究奕法。極為精微。」「今日奕法。中國殆亦退步不如昔矣。武棋較普遍。文棋則寥寥。我在上海領事厘。嘗與名手對奕。覺亦平常。可以日本之三。而當中國之一者。真令不勝今昔之感。」³²這種「發源自中國、由日本展示」的描寫，亦曾出現在〈三世英雄傳〉裡對日支拳術的討論，謝雪漁安排由支那人教給具中國血統的日本人田川思明，暗喻了中國拳術傳承給日本人轉化為日本柔術，雖其父田川清與拳師對戰失敗，但更強調這項支那拳術由

²⁹ 雪，〈日華英雄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4 月 15 日），第 62 號，頁 5。

³⁰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2 月 28 日，第 12479 號，第 8 版。

³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4 月 9 日，第 12579 號，第 8 版。

³²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5 月 14 日，第 12614 號，第 8 版。

日本人操演、發揚的意涵³³。再從〈日華英雌傳〉中，前川壽子、李麗君等人以各自的「立場」為支那拳術與日本柔道的淵源發言觀之，更可以看見謝雪漁企圖為異文化的接觸找出合理的解釋：

壽子曰。古時我國文事武備。固多學於支那。然全不拘守。出以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同而異。異而同。麗君曰。夫人之言。大有所見。我觀貴國人所作為漢文。所吟之漢詩。所書之漢字。皆別有一種氣骨。一種風趣。真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³⁴

由壽子以日本的身分自我表述對「支那漢學」的變化改造，麗君代表支那的身分附和這項說法，表現出對中日雙方相互尊重的立場，但也隱含對漢文化進入日本空間之後所改變的思考。

透過上文的討論，可以看見謝雪漁以「過往的支那」引領出中國與日本在文化上的差序。以下，將進一步討論其如何構築「世界」空間以開啟不同主體間的相互連結，並進一步演繹在「世界」空間的建構及其內涵。

（二）世界的構築

謝雪漁透過中日兩國人物的往來以及留學生的行旅移動，在文本中建立了亞洲（中國、台灣、日本、印度）與歐洲（德國、英國、美國）可以同時共存的空間。這個空間的範圍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以東亞國家與歐洲國家所形成的世界體系。同時，這個世界體系下的東亞又是指向，透過中、日留學生在這個世界中的行動而形成有內容的東亞空間，且能隨著時局之需，從世界轉換為具有家族、家園概念的東亞世界。在〈三世英雄傳〉、〈櫻花夢〉、〈日華英雌傳〉三篇作品中，都是展現出以東洋的位置與西洋／歐洲平等、齊位的態度，透過留學生出國學習知識的行動，表達出對這個「世界」內涵的追求與建構。

³³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0月31日，第4459號，第6版。

³⁴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12[1937]年12月1日），第53號，頁6。

薛建蓉認為〈三世英雄傳〉以日治德川末造、明治維新初期作為開展，「這段面臨內憂外患的歷史，正符合謝雪漁想要強調亂世出英雄的背景設定，尤以西方進攻日本的歷史，展現西方列強對於亞洲國家的野心，更可從中理解西方與亞洲如何產生衝突」³⁵，傳達出「東亞共和理想家國造象」³⁶。在這項論點之上，筆者想進一步闡述的是，謝雪漁在打造「理想家國」之前，如何預先暗示了建構世界的契機。在黃美娥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的西洋書寫研究中，提出台灣在日治時代進入空間意識的重大變革，此處指的「空間意識」是指透過西方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所形成的跨界文化地理知識系統與景觀，台灣人「開始從台灣瞭望世界，並在世界各洲、各國的地理座標中，去定位、詮釋西洋國家的存在角色，這與清代台灣大抵處於中國視野框架中認知西洋的入徑／路徑有所差異。」³⁷該文提出台灣人如何從台灣看世界，以及書寫哪些西洋物質與地景。筆者則是企圖進一步討論謝雪漁如何在小說中界定、書寫界的範圍與內在，並從自我建構的世界中反身訴說自我。

在〈三世英雄傳〉中，首先以日本留學生的視角開啟認識亞洲的概念。作品人物徐一郎等人出國留學時，適逢明治維新時期，對留學生事務的關注、在留學制度上也極為完備，處處展現了日本維新的企圖：「業與外國人親善。重訂通商條約。大詔煥發。命各地方官招考青年俊秀。分發往歐美各國留學。學成歸國。因材器口。以資維新。尤慎重選派海陸軍留學生。」³⁸

他們搭船出海，在海上看見的視野，牽引出觀看自我（亞洲）的視界：

於是扶船梯而登。時日將夕。紅霞一抹。與綠波相映。景色甚佳。倏忽灰色海鳥。雙翅如輪。斜飛水面。往來求魚。長雄曰。既有海鳥。此附

³⁵ 同註 5，頁 57。

³⁶ 同註 5，頁 72。

³⁷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9 年 2 月），頁 1-39。

³⁸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 9 月 21 日，第 4422 號，第 6 版。「因材器口」原文缺字。

近當有島嶼。思明白。至此已非我國境矣。一郎曰。雖非我國境。總猶在亞洲。³⁹

並藉由中、日留學生在德國合力徒手擒虎的行動，對比出亞洲人與歐洲人在膽識上的差異。一方面企圖強化亞洲形象，另一方面也描繪了中日合作的親善形象。「各新報無論夕刊朝刊。皆爭記載。且無不褒五人之英勇以為歐洲人之御猛獸。多利用機械。無敢以赤手空拳為之者。亞洲人之技與擔洵足使歐洲人生愧色。」⁴⁰

日治時期台灣人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交會，不只是接收來自世界的訊息，也主動與世界接軌，企圖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在朱惠足的研究中，討論二〇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新知識分子在思考台灣如何與世界接軌時，援引日本、中國、歐美作為媒介的思考與主張，越過以國家作為單位進行民族抗爭，「試圖以『民族』與「階級」等世界性的新思潮，讓台灣獨特的殖民地問題得以在全球性的抗爭與論述當中浮現」。雖然，朱惠足最後認為台灣知識分子「終究被回收到為日本挪用的西方種族、進化論、啟蒙等現代性論述當中，無法有效『超克』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困境。」⁴¹然而，透過該文的論點，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台灣人在殖民體制下應對世界潮流的方式。固然這類出於民族與階級立場的政治文化活動，與謝雪漁透過文學的書寫去建構世界的目的不同，卻都同樣呈現不同身分背景的台灣人企圖接觸世界的動機。

不同於〈三世英雄傳〉中，以日本為主、中國為輔所出發的亞洲視野，在〈櫻花夢〉則是跨越日本、印度、英國、中國等國家，從印度問題談到東亞事情，不斷提及與日華親善有關的言論，營造了日本企圖從中國尋得維持東亞秩序的方法，其目的是為對抗西方勢力。於1934年發表的〈櫻花夢〉寫的是1913年前後的世界局勢，涉及了幾項課題：第一次大戰即將開打之前、中華民國成

³⁹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1月1日，第4460號，第6版。

⁴⁰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1月16日，第4475號，第6版。

⁴¹ 朱惠足，〈第一章 現代世界體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與階級論述，一九二〇—一九三七〉，《「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年），頁27-65。該文所提的，以日本、中國、歐美作為媒介的主張分別是指：將台灣放置在日本帝國之下的思考、以「文化中國」加入世界體系、以歐美的民族自決風潮進行民族運動。

立、世界各國進出殖民地與統治問題、南洋貿易通路等⁴²。另一方面，謝雪漁在接觸與建構世界的同時，也不忘反身思考自我（東亞與日本）的內涵。在這三篇小說中都是以日本為主體敘述，接觸與建構世界的觀點自然也是以日本作為出發，而日本處在面對世界以及連結中國之間，漢文是重要的媒介，一方面可以自由跨越、穿梭於「台灣－中國－日本」三處地域的歷史文化空間，也就是「三處共同傳承的漢文化之地」，對內（東亞、日本與中國）進行多層次意義的連結，也可以漢文對外展示自我（東亞）的內涵。謝雪漁透過此種自由跨越、穿梭的方式，構築了可以在世界與東亞之間往返觀看，以及再現傳統文化的位置。

謝雪漁藉日籍學生鄭太平之口，傳達出以漢文連結東亞，以作為對抗「西洋文明毒素」的妙藥：

我帝國欲保世界平和。為東亞盟主。非謀日華親善。絕不能。二國親善機關。專賴漢文為樞紐。疎通意志。今我國之漢文。不絕如縷。雖然唱議在中學課程。改漢文為必須科。而以英文為隨意科。終未得實現。竊恐吾國失盟主之一資料。且今日之思想問題。因受西洋文明毒素。儒教失傳。綱常廢弛。始見其紛亂如斯。欲除此西洋毒素。舍儒教而外。寧有妙藥耶。⁴³

在 1937 年發表在《風月報》的〈日華英雄傳〉中，世界仍是以東洋和西洋的方式並置，透過前川壽子的身分經歷，直接陳述出東亞觀點，不同之處在於對中國空間的轉移與淡化。故事藉由中國女子李麗君因厭倦數位男子對其心術不端而心生離意，「未幾。受前川領事夫人。聘為家庭教師。束裝渡日。」⁴⁴文本很快便指出了日本、支那、東亞、親善等時局議題。不同於〈三世英雄傳〉裡，中、日合作的亞洲觀點，也不同於〈櫻花夢〉跨越日本、印度、英國、中國等國家去尋得維持東亞世界秩序的方法，在〈日華英雄傳〉則是直接將中國

⁴² 〈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2 月 4 日，第 12455 號，第 8 版。〈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2 月 9 日，第 12460 號，第 8 版。

⁴³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2 月 26 日，第 12477 號，第 12 版。

⁴⁴ 雪，〈日華英雄傳〉，《風月報》（昭和 12[1937]年 11 月 1 日），第 51 號，頁 8。

收編在以日本為發言主體的東亞之下。同時，也不同于〈櫻花夢〉中，中、日兩國的人到了台灣後，一起搭乘飛機進入無名的「新世界」。在〈日華英雌傳〉文末，前川剛因「曾任南京總領事。調任東亞局長。熟識支那情形。特任中國公使。」⁴⁵暗示了日本勢力單方的進入中國領土的問題。特別是李麗君讓兒子蘇大新認前川壽子為義母、入贅前川家，自己「入崑崙山修道。飄然去。不知所之。」⁴⁶這樣的安排彷彿迎合時局方向，事實上也暗示了謝雪漁對東亞身分問題的思考。

三、多重主體的身分編寫

（一）東亞身分的轉換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所推行的日華（支）親善與東亞主張之言論不曾間斷，謝雪漁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也都不約而同的呼應了這兩項具政治性色彩的時局主張，那麼，隨著親善言論與東亞政策的進程，作品中又是如何詮釋這項親善策略與東亞身分的變化呢？在薛建蓉以東亞論的觀點討論〈三世英雄傳〉和〈新蕩寇志〉的論著中，便曾提醒我們東亞論不是戰時體制下才出現的政策宣傳，二〇年代之前的東亞論述與三〇年代後期的大東亞政策亦有所不同⁴⁷。大抵而言，薛建蓉提出：

謝雪漁運用東亞論的概念，將戰爭的描寫到建構外敵出現的緊張局勢，並以同文同種的基礎，建構出的自我與他者的分別，以求中、日共同協力、融和的狀況，是為東亞共和理想家國造象。⁴⁸

在前一個段落裡，筆者討論了謝雪漁如何從世界的角度構築東亞的架構，在此要進一步討論的是：謝雪漁在不同的東亞架構氛圍下，各自形構什麼樣的

⁴⁵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11 月 5 日），第 75 號，頁 3。

⁴⁶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12 月 1 日），第 76 號，頁 6。

⁴⁷ 同註 5，頁 44-52。

⁴⁸ 同註 5，頁 72。

東亞身分？這項身分又由誰代表？最初，在〈三世英雄傳〉是以純粹的同文同種進行發展的中日關係論述。在〈櫻花夢〉中，不僅文本指涉的空間被擴大，並出現具有世界民族（種族）、民族主義概念的區分，東洋與西洋局勢的對立亦更為明顯，並企圖由日台親善以實踐「日華親善」。到了〈日華英雌傳〉則是凝聚在以日本為東亞中心的地理概念所出發的東亞訴求。中國與東亞是上述文本中兩項重要的關鍵，中國既作為獨立的主體與日本相互合作，但也以附屬的身分被編入日本的東亞需求之中。

在文本中，可以明顯看見謝雪漁一直將中國視為重要的合作對象，為了要連結這位東亞夥伴，漢文、漢文化可作為一項有效的策略，既呈現了相同的源流，亦能透過文化的變異來突顯日本的「東亞」形象。謝雪漁首先在〈三世英雄傳〉中提及「以禮相待」的「日支情感」以及日清的朝鮮問題⁴⁹。徐一郎等日本留學生在德國與支那留學生見面時，「以鄰國與同種之誼，相見甚歡」的情感⁵⁰，說明日本對支那的友善態度。不過，另一方面卻也常常出現眾人對支那國情的評論，比如在徐一郎等人與支那學生討論亞洲事情的對話中，流露出日本留學生為中國解釋的情況：

一郎曰。思明君素不服人。但知自己之才能。以為天下人皆不及己。不知論耐勞性質。實全球未能及支那人。君試翻閱支那歷史便知之。克忠曰。鄙意以為彼兩人必與君等三人同校。以同洲共種之誼。宜與之深相結納。彼此他日當國。其相援助之處必多。一郎亦曰。現時歐洲各國。皆思擴張勢力於我亞洲。在亞洲立國者。論疆域之廣。人民之眾皆不如於支那。其國勢今雖積弱不振。然將來與我國協力同心。以禦歐洲人勢力之東漸。非支那人不能。與之結納。詭不可不為之。長雄曰。支那人夜郎自大。未必如我等之思想。克忠曰。夜郎自大。固是支那人之習氣。然亦非盡人皆然。⁵¹

⁴⁹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2月2日，第4490號，第4版。同前文，大正2[1913]年1月8日，第4525號，第6版。

⁵⁰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1月6日，第4465號，第6版。

⁵¹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1月7日，第4466號，第6版。

這一段對話顯示了此時期的東亞身分是廣泛的包含日本、中國的亞洲，身分的內涵亦是由雙方相互友愛、合作所達成的，不過，發言權卻是落在日本人手中。再由支那留學生王大用提問，若中日雙方在戰場相見該如何為之的發言來看將更清楚：

一郎曰。君何為發此愚論。食毛踐土。恩可忘乎。我等祖宗自流寓以來。食其之毛。踐其地之土。或經千餘年。或經數百年。最少者亦不下百年。已與支那無恩義之可思矣。克忠亦接言曰。支那歷朝革命。其事新朝者。則為新朝謀。事舊朝者。則為舊朝謀。各忠於所事。亦以身受其所恩。義不容辭耳。長雄曰。異日兩國為萬不得已之事至於相見疆場。若念同學關係。不論為誰師敗而被擒。總以禮相待。略盡同學之情耳。⁵²

雖然是有關戰爭的對話，卻也指出了中國與台灣在國家情感上的切割、中國政治時局歷來混亂的情況，特別是，由日本回答支那對未來的提問，又一次暗示了東亞身分的轉換。這類與國家、政治情義有關的言論，在〈櫻花夢〉中更為明顯。謝雪漁企圖為台灣從中國抽離、轉而成為日本人的情況進行解釋，甚至以作品人物林平臣的例子來說明「主動歸化成日本人」的理由⁵³，同時，也以經歷過甲午戰爭、曾有渡廈經驗的台灣台南人謝祖香說出：「因厭本國政府腐敗無力保護口民。遂歸化日本。」⁵⁴

此時期的東亞橫跨了日本、中國、台灣、印度，謝雪漁以黃種與白種的對立問題，藉第三者印度人慕阿厘之口，道出欲掙脫英國殖民統治、聯合中國、推日本國為盟主，引領出「亞洲門羅主義」的必要，暗示了日本「東亞振興」的企圖⁵⁵。

我印度地廣人多。雖不及於中華。而於日本則過之。現時中華之國勢。尚未振興。睡獅不醒。無可觀法。無能為助。其可為他山之石。可以攻

⁵²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2月2日，第4490號，第4版。

⁵³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9[1934]年11月24日，第12440號，第8版。

⁵⁴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0[1935]年4月5日，第12575號，第8版。
□為原文缺字。

⁵⁵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9[1934]年11月21日，第12442號，第8版。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0[1935]年3月26日，第12566號，第12版。

錯者。其惟日本乎。……光復我五印度之疆土。建獨立國。啟發民智。變革國俗。聯合中國。推日本國為盟主。更與諸小國團結。實行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⁵⁶

更重要的是，這段對話是由日本人鄭太平以牡丹社事件發生當時，清廷將台灣視為化外之民的態度，進一步對比英國治理印度、日本治理台灣的政策，對比西方勢力對東方的武力攻嚇。另一方面則是突顯日本「同化」台灣的友善，說明：「印人不欲同化於英人。而英人亦不望其同化。日本之於台灣。不視為殖民地。孜孜汲汲。日望其早能同化。」⁵⁷再一次強化並確立了以日本在東亞發展下的正面形象以及領導者的位置。又如支那人鄭忠漢以英語告訴鄭太平：「黃白人種。必不能不一戰。以決雌雄。印度之淪落。暹羅之弱小。皆不足與有為。其他亦微微不振。東亞大局。所賴者日華二大支柱耳。」⁵⁸

駐上海的日人領事亦曰：

今則東亞形勢。歐美人與我共之。中日關係。宜益使之如膠如漆。固結亦開。欲致國家富強。種族繁盛。在乎振興文化。貴國文化之美者。敝國宜學諸貴國。……欲為黃種圖存要組成異體同氣之兩國軍隊。分體各當一面。或合體共當一面。安危相繫。存亡與共。各為二國。實為一國。⁵⁹

這些說法達成了中日兩國對東亞的共同發言，即使有台灣問題，但並不影響中日之間為了維持東亞局勢安定的合作。不過，看似親善、平等的合作關係，謝雪漁仍將中國以衰頹的形象出現，將東亞的身分逐漸轉向了以日本作為發言中心的必要性。鄭太平曰：

今日吾輩之所痛感者。在以如何方法。使中國人理解日華共存之大義。在中國人殆皆以為日華共存標語。乃日本人自家所必要而造出者。實為

⁵⁶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1 月 21 日，第 12442 號，第 8 版。

⁵⁷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4 月 11 日，第 12581 號，第 8 版。

⁵⁸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2 月 18 日，第 12530 號，第 8 版。

⁵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3 月 25 日，第 12565 號，第 8 版。

誤解。…(略)…若團匪事變後。不有日俄戰爭。則滿洲早非中國之物。
而中國人似未悟也。⁶⁰

到了〈日華英雌傳〉中，東亞成為重要主題，中國與日本都在接觸著文明，但在這篇作品中，謝雪漁不再尋找血緣、歷史的關係，而是直接訴諸東亞議題，在這個層次上為日華親善的必要性與行動作出說明。謝雪漁以支那人李麗君與日本警察合力捉支那盜賊張華的事情，作為日華合作實踐的證明：「日華兩國之人。同心同德。欲興隆我亞洲發展我黃種。蓋易如反掌也。可不勉哉。」⁶¹

林芳玫認為謝雪漁在〈日華英雌傳〉涉及政治的內容並不多，企圖讓「日與華的平行對話」，林進一步以盜賊張華與日本女性的關係、代換日人姓名等行為提出日華之間的「雙重自我」觀點：「張華=一枝梅=加藤勇這一連串身份的代換，卻顯現出當下此刻底層人民之間默許彼此於中、日兩種身份進出。」⁶²這項「雙重自我」的身分，指出了謝雪漁對於身分內涵的編寫特點。同時，筆者認為謝雪漁安排支那人李麗君及其兒子進入日本的空間，也讓東亞的範圍與身分發言的位置更為集中，中日兩國的人民一同在東亞的中心對時局發表言論，並由日本人代表發言主體，在壽子邀請麗君擔任女子柔道學校教務中，提出了中日兩國相互依存的必要與作法：

日華兩國之於亞洲地位。車輔相依。盛衰興亡。兩國實同其休戚。故不能如秦人視越人。肥瘦不相關。日本以其所長。補中國之不足。中國亦以其所長。補我國之不足。文化共通。以創東洋獨得之文化。振興東洋民族之精神。今日亞洲形勢。文武兩道。要竝行不悖。⁶³

⁶⁰ 同註 59。

⁶¹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3 月 15 日），第 60 號，頁 6。

⁶² 同註 27，頁 44。

⁶³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8 月 16 日），第 70 號，頁 8。

（二）不在場的台灣

在〈三世英雄傳〉和〈日華英雄傳〉中，缺乏以台灣作為主體位置的出現。前篇作品呈現從中國看日本的視角，台灣甫被清國割讓，因而在中國的版圖失卻台灣的位置。後篇則是從日本帝國觀看中國，台灣被包含在日本之下。在這兩者之中的台灣都被隱身在雙重帝國（中國與日本）之下。而在〈櫻花夢〉中，台灣被以受到觀看的主體，依附於日本的地方姿態現身。在林淑慧以〈日華英雄傳〉為主的討論中，曾提出謝雪漁為何不直接書寫台灣的女性、在小說中看不見台灣與日本的位階關係，也看不到台灣本地的問題，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謝雪漁對中國的貶意，以及身為寫作者的謝雪漁處在不利的地位，因此以觀看世界的方式，要求異國的情調、世界的想像⁶⁴。筆者則是認為，謝雪漁以隱身的方式描寫台灣問題，所呈現的是謝雪漁觀看台灣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身分，也暗示了一種自主遊移的位置，台灣與日本、中國（或清國）的位階，則是在相對的觀看主體與位置之間被顯現。

謝雪漁在〈三世英雄傳〉中所提出的台灣身分，是由中國人鄭繩祖說明，圍繞在明清之際的歷史問題⁶⁵，這裡的台灣缺乏身分與位置，這種「匱乏」的身分與位置是為了被作為連結日支關係、敘說清國歷史的媒介。到了1937年發表的〈日華英雄傳〉中，台灣的位置澈底消失，轉而讓中國與日本的時間感並置，但卻多由日人回溯中國文史發展，借日本人之口為中國古代的傳聞發聲，隨之進入日本的現代文明觀點之中。

謝雪漁在〈日華英雄傳〉中大篇幅的對比支那與日本的料理，從食材、氣候、內容與外觀、作法、味道等等，牽引出兩國人民習慣的差異，也帶入了謝雪漁對國民性的觀察。又如壽子為麗君談論或解說獅子在支那與日本對獅的不同意義、日本在正月時懸掛於玄關上的草製大蝦等物件的意涵、日本相撲、日本能劇、武術、奕法等層面與中國歷史的淵源及變化，展示了以由日本介入或主導的情況。又如由日本女謠曲家藤田勝子為大家解說猩猩與中國怪談的典

⁶⁴ 同註3，頁142、145。

⁶⁵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1912]年12月24日，第4512號，第6版。

故、日本歌謠與中國古漢樂的關係、甚至以國籍法說明九州人「亦有多少混有漢族之血液者」⁶⁶。

而到了〈櫻花夢〉裡，台灣（地理／地方）作為媒介開啟台灣與中國的新往來。小說的前半部是以中國人莊慕周、謝山輝等人在中國發言的方式，呈現中國處在東亞下的處境、關係。後半部則是以謝山輝等人赴台遊覽的方式，讓「台灣」初次以獨立的空間場域概念被呈現，從中國到台灣的「位移」，也象徵了中國人原先站在中國的發言位置，被轉移至日本空間下的台灣。尤其是，謝雪漁描寫謝山輝等人從廈門搭船到基隆港時，渡過澎湖溝，強化了中國與台灣的距離，亦即分離的事實⁶⁷。

謝雪漁曾在 1911 年發表的〈台灣之形勢〉一文中，以台灣與澎湖島在清國與日本這兩個政權下所遭到的不同對待：清國讓棄台灣，未知台灣之海權、日本視台灣為南陲重鎮，提領出台灣位置的重要⁶⁸。因而，由澎湖溝所區隔出的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距離，切斷了在台灣的中國敘事，但也間接指出在台灣的中國因素。謝山輝等人因不想參與中國北伐，經日本人鄭太平提議，計劃從中國廈門的鼓浪嶼出發到台灣，先經台灣渡日本東京遊覽，再赴台灣考察。不過，當謝山輝等人在基隆港轉航時，謝雪漁切斷了「經台灣渡東京」的敘事，安排謝山輝等一行人在鄭太平的導覽下，先遊歷基隆名勝，後又從基隆移動到松山，在松山巧遇台人同宗謝祖香，並參觀台北殖產局、專賣局、總督府、新公園、台北圖書館等處，而原先欲由台灣渡東京的計畫，也在這樣的情境下被謝雪漁取消了。透過謝祖香的介紹，謝山輝等人與「年可四十許。穿清制衣冠」的半老書生林湘蘭見面⁶⁹，因此與台灣人有了較深刻的台灣對話。只是，不同於日本鄭太平對當代的（日本的）台灣的解說，由台人書生林湘蘭所發言是古老的（清國的，支那的）台灣，謝雪漁將兩種時序的台灣同置並存，呈現了既欲切割又欲回歸的歷史敘事。

⁶⁶ 雪，〈日華英雌傳〉，《風月報》（昭和 13[1938]年 10 月 17 日），第 74 號，頁 6。

⁶⁷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3 月 28 日、29 日，第 12568、12569 號，第 8 版。

⁶⁸ 雪漁，〈台灣之形勢〉，《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 44[1911]年 1 月 1 日，第 3814 號，第 3 版。

⁶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4 月 18 日，第 12588 號，第 8 版。

雖然在〈櫻花夢〉的後段，中國人與日本人同時進入日本時序下的台灣，然而，卻是由赴中國留學、原不諳漢文的日本人鄭太平帶領中國人謝山輝（前清）等人遊覽殖民地台灣，並說明台灣地名的由來以及相關歷史文化。謝山輝與台灣宿儒林湘蘭見面，談論台灣典籍，似是為「台灣關係」提出解釋，由林湘蘭說明：「瀛壖百詠序曰。明季遠游篇。載東香一篇。稱其地為台員。台灣之名。入於中國始此。」⁷⁰同時，也大量運用了鄭氏王朝時期的歷史，呈現台灣受到鄭氏家族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強化謝雪漁對於忠節精神的崇敬。鄭太平帶領謝山輝等人遊至台灣延平郡王祠時，為大家解說：「儀門內檐前懸一額。書前無古人四字含有二意義。一是台灣開闢洪荒。鄭氏以前無建國之人也。一是延平盡忠不能盡孝。」⁷¹

不過，有趣的是，帶領中國人到台灣遊覽的日本人鄭太平，在抵台之前並不了解台灣社會局勢，認為台灣充滿蠻煙瘴雨、惡疾、殺人生蕃、變亂等亂事，而這樣的疑問卻是由中國人鄭忠漢為其解答「台民非真好亂」⁷²：

現時台灣新隸日本版圖。方籌剿撫事宜。不久當見平靜。在台老師宿儒。漢學精深。安土重遷。留而不去。改籍為日本國民者。定多其人。不能赴吾第一故鄉之泉州。亦當赴第二故鄉之台灣。……。吾鄉之渡海謀生者。皆以台灣為海上之蓬萊仙島。樂不思蜀。弟蓋誤聞而誤解者。⁷³

亦透過中國人謝山輝說出日本維新後的富強之道、台灣地位的重要性：

山輝曰。日本自維新以來。上下一心。力收富強之效。割讓台灣。合併朝鮮。南北連鎖。得制中國死命。且閩省有不割讓之約。入其勢力圈內。將來兩國有事。其取吾閩如俎上割肉耳。慕周曰。日本人兵法學於歐洲。棄其皮骨。吸其精髓。運用入妙。⁷⁴

⁷⁰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4 月 20 日，第 12590 號，第 8 版。

⁷¹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5 月 8 日，第 12608 號，第 8 版。

⁷²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4 月 6 日，第 12576 號，第 8 版。

⁷³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2 月 29 日，第 12480 號，第 8 版。

⁷⁴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0[1935]年 1 月 19 日，第 12440 號，第 8 版。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知道台灣的身分與重要性在中國與日本的歷史關係與對話之間被陳述出來，以落後的中國形象對比出現代化的台灣（與日本）。無論是〈三世英雄傳〉和〈日華英雌傳〉中被隱身的台灣，或是〈櫻花夢〉中被轉述的台灣，都呈現了謝雪漁在編寫中國與日本的身分內涵時，間接顯露出觀看主體的相對位置。

四、結語

謝雪漁的〈三世英雄傳〉、〈櫻花夢〉和〈日華英雌傳〉這三篇作品雖然寫於不同年代，卻可以歸結出共通的敘事主軸：日台支歷史的親近性、同文同種與漢學論述、日支（華）親善與東亞和平的倡導。同時，這些敘事主軸也隨著時局變遷，在敘事上呈現了不同比重的書寫，並透露了謝雪漁這類型作品的四項特點。

首先，是關於中、日之間的歷史與文化之運用與詮釋，所顯露出的「落後的時間感」。謝雪漁擁有傳承自清國的「支那文明」，進入殖民統治的情境之後，也接受了從帝國日本輸入的「現代文明」，面對「中國—台灣—日本」之間的往返、遊移，他選擇以作品人物的出身與歷史的親近性作為連結，以漢文作為中、日兩國共同的文化資本。然而，這些傳自中國的文化，在進入日本的空間之後自然地產生本質上的變化，最明顯的是，作者透過料理作法、忠孝觀念的描寫，呈現出因地理氣候、風土民情的差異形成不同的慣習，也突顯了兩國之間國民性的差異。

其次是，謝雪漁藉由文本空間，鋪陳出以東亞與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空間，透過中、日兩國留學生的交會、往來，一方面構設出世界的範圍，1912的〈三世英雄傳〉是以日本為主、中國為輔所出發的亞洲視野。1934年的〈櫻花夢〉跨越了日本、印度、英國、中國等國家，而1937年的〈日華英雌傳〉則是直接將中國收納在以日本為發言主體的東亞體系之下。另一方面，又以外在國際現實的政治角力呈現內與外的依存關係與對立關係，對外強調東、西方勢力的對抗，對內則關注以漢文化結合中、日兩國的親近性。謝雪漁以內、外情勢的交

合，構築可以在世界與東亞之間往返觀看、再現傳統文化的可塑性，並間接勾勒出其心中理想的新世界。

也因此，第三項則是關於內部的東亞身分與發言主體轉換的思考。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推行的日華（支）親善與東亞主張的言論不曾間斷，我們亦可由謝雪漁在作品中看見這些呼應時局政策的書寫。在〈三世英雄傳〉裡的同文同種關係，呈現中、日兩國具有文化差序（古老與現代、落後與維新）的亞洲關係，以及平行的對話關係。在〈櫻花夢〉中提出「日台親善」與「日華親善」的合作，漢文連結了中、台、日三方的東亞關係，呈現中國與台灣的分離現實，當擁有「南清」身分的謝山輝等中國人進入日本場域——台灣——之後，更代表著東亞身分的集中與融合，並由日本人向中國人解釋台灣的行為，合理化以日本為發言者的位置。到了〈日華英雌傳〉則是以日本作東亞地理的中心，藉由中國人李麗君進入日本的移動，象徵東亞主體的集中，而中、日兩國女性圍繞在有關中日文化議題的對話，以及日本自由進出中國的行動，則是更加強化以日本作為發言主體的必然性。

固然，謝雪漁的書寫呼應著時局政策，但透過其對台灣角色的詮釋，或許可作為其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以自身經驗對文化與歷史所進行思考。因此，第四項是關於謝雪漁對自我身分編寫所延伸出對於台灣的思想，即「不在場的台灣」的營造。在〈三世英雄傳〉中的台灣缺乏身分與位置，僅是作為交流的媒介，橫越在清國與日本之間。在〈櫻花夢〉裡，台灣被動的作為主體與地理位置，由日本人代表台灣發言。到了〈日華英雌傳〉，台灣又從文本中缺席，轉而以中國與日本作為主體，在日本為中國古代發言的情境下，「古老的中國」隨之進入日本的現代文明觀點之中，並被收納在以日本為主體的東亞空間之下，同時，透過中國混亂、落後的狀態，亦間接顯示作者曾／未想過以台灣作為進入東亞日本的位置與可能。

參考文獻

一、作家作品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1912]年 8 月 24 日，第 4395 號～大正 2[1913]年 1 月 10 日，第 4527 號。

雪漁，〈櫻花夢〉，《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9[1934]年 11 月 7 日，第 12428 號～昭和 10[1935]年 6 月 22 日，第 12653 號。

雪，〈日華英雄傳〉，《風月報》（昭和 12[1937]年 7 月 20 日），第 45 號～昭和 13[1938]年 12 月 1 日），第 76 號。

二、專書論文

朱惠足，〈第一章 現代世界體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與階級論述，一九二〇—一九三七〉，《「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 年），頁 27-65。

李育霖，〈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闕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65-210。

邱貴芬，〈落後的時間與台灣歷史敘述：試探現代主義時期女性作家創作裡另類時間的救贖可能〉，《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83-110。

柳書琴，〈第三論 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Taiwan, 1937-1942）〉，收於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63-90。

三、期刊論文

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10 年 2 月），頁 83-124。

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9 年 9 月），頁 169-204。

林以衡，〈英雄、歷險、桃花源：由日治小說《奇人健飛啟疆記》的試煉之路論其敘事建構的原型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 18 期（2011 年 1 月），頁 69-96。

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份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第 23 期（2013 年 12 月），頁 29-62。

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中國文學研究》第 24 期（2007 年 6 月），頁 119-152。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9 年 2 月），頁 1-39。

薛建蓉，〈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39-78。

四、學位論文

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鄭明珠，〈謝雪漁小說〈櫻花夢〉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 年）。

